

2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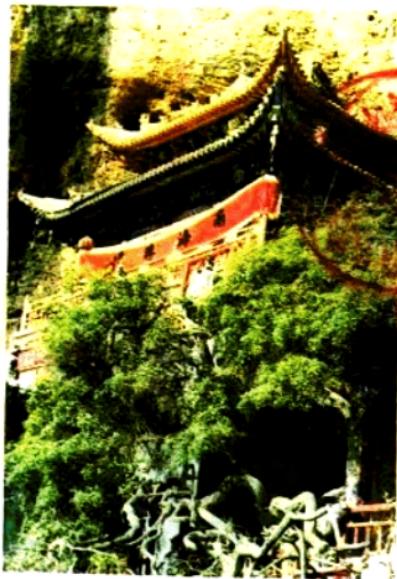
15

武山县文史资料选辑

(二)

政协武山县文史委员会编

89



目 录

- 回忆中条山抗日战争片断 王景凡 (1)
革命历程上的一些回忆 康秀峯 (11)
记国民党119军起义经过 王景凡 (22)
弃暗投明报效新中国 潘炳宗 (32)
武山县初解放时的青年宣传队 杨允文 (43)
解放战争时期武山中学的学生运动
..... 杜应源 (56)
滩歌乡农民的抗暴斗争 邢效贤 (76)
蓼阳小学见闻点滴 周本泽 (83)
裴慎创办蓼川小学的经过
..... 杨泉 李遵达 陈衍祥 (94)
白朗经过武山记实 麻士杰 邢效贤 (102)
武山县滩歌乡万花寺惨案记略
.....

-邢效贤(109)
未满一年两令死.....杜应源(115)
1939年武山县红峪河水患目睹记.....
.....令 恭(120)
张澍——一位才华非凡骨气撑天的民主斗士....
.....杜应源(126)
武山县民国大事记.....县志办、党史
办供稿 麻士杰 杜应源 马登云 整理(149)

回忆中条山抗日战争片断

王 景 凡

六十年前去从军，为保疆土爱国心。

晋南战后守黄河，天天都在烽火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肃地方部队169师，奉命开赴抗日前线，阻击日寇，并参加了大规模的阻击战——中条山战斗。无数甘肃热血男儿，在强敌压境，生灵涂炭，政府腐朽无能的严酷情况下，犹气宇轩昂，血染沙场，为国捐躯。本文所载，均为我的亲历亲见，唯事隔半个世纪，难免有遗误之处，望知情者补正。

一、回到抗日前线

165师是鲁大昌的新编14师改建的，下辖985、986、987、988四个步兵团、骑兵1团及师直属部队，共约700余人。师长王治岐，是

天水山阳川人，黄埔一期生。部队官兵，大多是甘肃人。驻甘期间为独立师。1936年离甘东下抗日，调往陕西韩城芝川河防，令辖80军，军长是孔令恂。1937年在河防整编为493、494、495三个步兵团及师直属部队。1938年调往中条山。我在驻守河防时，任493团团副。1936年春，我和武山人潘日忠（字元鼎）被调往贵州遵义陆军步兵学校高级教官班学习。是年冬毕业后，仍返回中条山原部队。潘日忠派495团任营长，我派493团任团副。

我师在中条山望塬凭据深沟，坐东向西构筑工事防守，面向垣曲、夏县、平陆之线的敌人。493、494两个团为第一线，495团在师部后面为师预备队，师右翼是第三军，左翼是陕西警备八师，调到中条山不久，装备较我师还差。

我师为争取主动，不时派遣小部队，在阵

地前沟西埋伏，进行游击活动，并搜集情报，有时还在敌人必经道路上，在我有利情况下伏击，这样牵制、打击、消耗敌人。

敌人恐怕铁路运输遭受我军袭击，在铁路沿线筑有碉堡。我军对面垣曲、夏县、平陆之线敌人常住有二、三千人，接近我阵地有许多据点，并配有炮兵，时时向我射击。并利用交通车辆上的优势，随时调集较多的兵力，四五千到七八千人，向我方骚扰或攻击。经过几天战斗，受到挫折后，仍就龟缩回去，几年来就如此相持不下。

1940年春。敌人集中约一万人左右，采用集中兵力，突破弱点，掌握在地形上与我军平衡，扩张战果，采用分割包围歼灭战术和我军作战。第一天早晨两点多钟，先是炮兵向我阵地猛烈射击，继是步炮配合进击；天明后用空中轰炸，连续几次强行攻击，均未得逞。第二

天，双方炮火猛烈射击，延续到第三天凌晨。警八师阵地被突破，我师正、侧两面受敌，不得不向后转移，否则，就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敌机继续轮番轰炸，步炮配合进击，我军退至太塬峡（这是记忆的名字），未能立住脚，晚间又退到南沟。南沟是中条山由北向南流向的一条小河，经祁家河入黄河口岸的一个小村。**495团**在撤退时已失去联系，

二、南沟山上战斗

部队驻南沟村是背靠黄河，只有在山上与敌人拼死博斗，才是唯一生路。师长王治岐发出在山上拼死抵抗的命令，**493团**在沟西山上，**494团**在沟东山上，师直属部队及警八师是退下来的部队组编的师预备队，师长在**493团**附近指挥作战。

部队退至黄河岸边的南沟，面向强敌，只有背水一战，与敌人作拼死的博斗。**493团**的

部署是：一、二营为第一线，第三营和直属部队为团预备队，团部设在一条窄狭小高地上。沿山脚下有许多窑洞，系第一战区补给中条山作战部队临时转运仓库，保管员已临阵逃跑。我们打开洞门，内存有许多面粉、大米、饼干、新军服、大量子弹、手榴弹、少许步枪。部队从战斗开始，没有吃过饱饭，随即把饼干、大米都发给部队，部队士兵换上新军服，枪枝弹药都得到补充，部队的战斗情绪马上提高。一面休整，一面警戒，筑简单掩体，准备作战。次日拂晓，战斗打响了，山上灌木丛生，敌人已失去武器上的优势，虽然炮声隆隆，飞机轰炸，作用甚微。双方一遇上，就用步枪射击，或用刺刀拼杀，手榴弹威力最大。这样的山头争夺战，彼失我得，得而复失，双方损失都很惨重。我军已下决心死战，下午又把预备队投入战斗。

494团战斗的东山较我团的地势高，他们除了和它的正面敌人战斗外，还由侧面用火力支援我团。由于我军士气旺盛，作战勇敢，又能互相支援，敌人不得不向后撤退，直战斗到晚间，敌人已不支退去。就在这时，接到战区的命令，撤过黄河，坚守黄河河防。我部遵命，一面监视敌人，一面逐次撤退。过河后494团担负河防任务，其余随师部在河防后山上整休，以后又转移到渑池县属杜家镇。

三、495团在祁家河的战斗

495团在我师向南沟撤退时，就失去了联系。当我们在南沟山上战斗时，它退到一个名叫祁家河的村顶山上，发现村边有军队休息，看不清是我军还是敌军，团长潘乐伯（天水人、黄埔军校六期生）即将部队配备在山头上成战斗队形，派人下山侦察，侦察人员到半山已看清楚是敌人，即跑回来报告。潘即下令，

集中迫击炮，轻重机枪火力射击，敌人遭到意外袭击，伤亡很大。但仍发怒咆哮，在弹如飞蝗的一片战乱中，还向山头攻击，均被我打下去了，直到夜间，敌人损失惨重，只得退到村东山上与我军对抗，我495团也有伤亡。当时495团虽然打了一场胜仗，但因脱离大部队，已成孤军作战，遂乘黑夜，向后撤退。第二天，敌人经侦察得知是一股失掉联络的部队，便约会在南山被挫败之敌，分路追击，495团终因孤立无援，被敌击跨。团长，副团长，一营长和几位连长，均壮烈殉国，士兵伤亡无数。营长潘日忠收集不到二百人，由张茅渡黄河，回到河南渑池县师部驻地——杜家镇。

四、坚守河防，以孝移忠

165师渡过黄河时已作了调整和补充。493团副团长孙铁峯升任495团团长，第一营营长高竟成升任付团长，我调任第一营营长，全师

营长以上，由师调派；连、排缺员，均由下面选拔擢升。运输部队，补助到战斗队，师统一派人到甘肃接收新兵补充部队。

经过一段整休，我团奉命接替河防，我接替了494团赵承志（武山人）营白浪渡口防务。白浪渡口系三门峡以东河水入峡的一个渡口，是河南渑池附近几个县往山西必经的渡口，地势险要，并筑有永久工事，易于固守。敌人在南沟山上也筑有据点，并配备炮兵，经常向我河南阵地射击。

就在我守河防期间，忽接家中紧急电报，传来不幸的消息：“母亲逝世，速回奔丧”。当时我悲痛万分，急欲请假回去，待到师部批示：“大敌当前，防务紧张，应以孝移忠”。我从事军队生涯多年，未能侍奉过母亲；母亲有病，在前线抗战，不能探望；母亲逝世后，因守河防，不能奔丧，有亏人子之道，有负养

育之恩，遗恨终生，徒伤悲奈何。在出殡之日，家人正焦急等待，师部派的人带我的“遙祭母文”并友人送的奠帐等到家吊祭，获悉后我心稍安。在日寇猖獗，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我只有以孝移忠，克尽职责，为抗战尽力。

在中条山战争中，165师的全体官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当时壮烈殉国者，因年久遗忘，仅军官中能够记忆的有：495团最多，团长潘乐伯，副团长1人，营长2人，排长、军士无数；494团仅连长牺牲10余人，其中姚池崇是甘谷人，军校11期生；493团5人，其中白学回，通渭毛家店人，军校毕业，年仅22岁，曾是我任连长时的排长，青年有为，至今回憶，令人惋惜。

陕西部队警八师，据说阵地被突破后，师长、参谋长几次组织部队阻击，均未能成功，

在敌机轰炸中，壮烈殉国。

国民党政府，对这些殉国志士，没有任何表示，实属憾事。

革命历程上的一些回忆

〔康 秀 峰〕

1910年我出生在甘肃武山县洛门镇一个贫民的家里，上学至初中一年级后，因家境困难而失学，使我走上了流离飘泊的生活道路。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和甘肃地下党早期的一些同志发生关系，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现回忆叙述如下。

1928年春天，我18岁时与同乡结伴来兰谋生，时值西北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在兰设立“政治训练班”（以下简称“政训班”），我因求业心切，当即应名报考，幸被录取，总算得到了一个啖饭之处。当时有王儒林、郝盛兰（后改名为郝新亚）同志也入了“政训班”和

我同学。因我们都是青年，革命人生观尚未确立，所以只是同学友谊关系。“政训班”约办了七、八个月，因冯玉祥已访苏归来，思想十分进步，在西北军中不断宣传和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所以课程中有马列主义学说，使我大开眼界，对苏联十月革命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新鲜事物。年底“政训班”结束全部分配工作，我因有病住院未能分派，病愈后又几经周折，才于1932年初经友人介绍，到银川马福祥办的私立蒙回小学当教员。

1932年8月，有一天突然接到在洛池工作的一位朋友托人送来一个便条，约我相会，我匆忙到洛池时才发现是王儒林、郝新亚二同志，一见之下，不免吃惊。原来王儒林同志在和我分别后一直从事党发展武装的工作，我也间接闻知。先是1932年3月王儒林同志在靖远

驻军警备第三旅任营长兼军法主任，奉党指示为策动旅长王子元部起义归顺而被王翻脸扣留，并将王儒林同志全营枪枝收缴，后被别的同志冒险释放潜逃。又于同年5月20日参加和组织了由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靖远北湾水泉暴动，并被任命为靖远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杜润芝为政委。和敌人进行了多次残酷斗争，终因敌强我弱，孤军无援，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不久王儒林同志在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周密的部署后，由郝新亚同志陪同进入宁夏中卫，转赴银川找我。我们会面之后，当晚郝新亚同志即离开我们返回兰州去了。

为了掩护王儒林同志并使他绝对安全，我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找到一个叫王毅的学生家里，使王儒林同志潜伏了下来。这个王毅家，位于城郊荒野一个破旧寨堡中，四面是空

旷开阔的荒滩和耕地，很少被人注意。王毅的父亲叫王文举，当时年约50多岁，是一位开朗豪爽、热情洋溢爱交朋友的人，和王儒林同志很快就交上了朋友，从此，我紧张的心情才稍为平静了一些。

王儒林同志在银川潜伏隐蔽三个来月，正当他决定离宁返兰重新集结力量，进行新的斗争的时候，党派吕明成同志专程由靖远来宁迎接王儒林同志。这时已是1932年的深秋季节，我决心辞去教学职务，随同王儒林同志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这时蒙回学校校长史良若的弟弟史悟亭同志（当时职业是马鸿宾总部军法处的军法官），因和我相处久，思想十分进步，坚决要求随王儒林同志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于是我们整理行装，王儒林、史悟亭、吕明成和我乘商业运输驼队出发来兰。这时由于土匪不时出没，驼队怕发生意外，就避开大路